

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 新文化建设的历史实践*

杨 俊

【内容提要】延安时期，中共提出了具有深刻联系又有根本区别的三种新文化观：旧民主主义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对新中国的文化设计首先是建设新民主主义新文化。这是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实践和经济实践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的。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实践的走向是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从允许“除反动文化以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一定范围内合法存在，逐步走向强调需要批评这些思想文化的“错误”，最终明确要求批判和肃清它们。由于中共领导人对文化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这种文化过渡不仅具有特殊的内容和方式，而且具有先导性，对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 新文化建设 历史实践

作者简介：杨俊（1970-），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233）。

用一定的以统治阶级思想为核心的观念形态（即“文”）去塑造和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即“化”），是为“文化”。而各种具体的观念形态和思想体系的形成，以及这些文化形式的载体及其支撑体系的建构，是为“文化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大变革时代，这一时期，中共领导进行的旨在确立和巩固与新政治、新经济相适应的新文化活动的总和，即为“新文化建设”。

一、新旧文化之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新文化建设的理论源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由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构成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这其中经济、政治属于社会存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则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文化作为人的创造性的对象化活动，其内容和形成发展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就功能而言，文化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其作用源于文化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而对社会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文化可以推动或阻碍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基础的发展。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历史演进和时代创新研究”（17AZ004）的阶段性成果。这里定义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即1949年到1952年期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页。

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成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基础上分析文化问题，得出了关于文化性质的根本认识，区别了新旧文化，从而形成了中共文化革命的对象、文化建设的任务和文化建设等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

1. 文化革命的对象——“旧文化”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这种社会性质相适应，产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文化，也就是说，既有殖民地文化又有封建文化。首先是封建文化，其基本思想内容是封建等级观念和封建特权思想，以及“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维护封建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等。在中国已经进入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凡是要求在国民中灌输旧礼教旧思想，主张维护纲常名教、尊孔读经，认为西方文化不如中国传统文化，抵制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等都是这种封建文化的主张。其次是反映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统治的殖民地文化，也就是帝国主义文化。一切狂热地颂扬西方对华的“丰功伟绩”和“伟大友谊”，对西方的欺压曲意逢迎、顶礼膜拜和奴颜媚骨的奴化思想，都是这种文化的表现。相对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的新的经济力量、阶级力量和文化主张，这些封建文化和殖民地文化是没落的和反动的，因此属于“旧文化”。这两个旧文化，“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①。

2. 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并为之服务的文化——“新文化”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艰难中缓慢发展。相对于封建小农经济说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新经济。与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这些力量相对于封建地主阶级，它是新的政治力量。随着中国新的经济、政治力量的产生和发展，作为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为之服务的新文化也产生了。这种新文化的根本要求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压迫，反映资产阶级的主张，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文化。

近代以来，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属于旧的民主主义革命范畴。五四运动之后，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最终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新式革命。这种政治上的区别，也体现在文化上：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起点，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业已腐化、无力”的旧民主主义新文化。在“五四”以前，产生了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化”，那时“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②。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相适应，这一时期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兴办新式学堂与坚持科举取士之争，资产阶级新学与封建主义旧学之争，取法西方的西学与坚持中国传统的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这些斗争在当时都具有启蒙作用和进步意义，但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6-697页。

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这种“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①。

第二，中共这一阶段文化建设的目标——新民主主义新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它的要义在于：（1）这个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一是“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②。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③。二是由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新民主主义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④。（2）新民主主义文化内容是“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⑤。后来这“四大口号”发展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一，这个新文化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带有中华民族的特点，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同时又注重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其二，这种文化坚决反对一切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封建迷信思想，反对愚昧、武断、无知的文化状况，反对玄学、迷信等虚妄不实文化，主张唯物史观和无神论的思想，要求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其三，这种文化是大众的，它是为全民族中占大多数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而不是仅仅局限服务于少数统治阶级和上等“文化人”。这种文化既然是大众的，因而就是民主的，它要求面向广大人民群众，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其四，“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⑥。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并非为无产阶级所独享，而是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3. 中共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新文化”

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反映新兴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文化，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⑦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且与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私有观念做彻底决裂。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建立在彻底批判资本主义文化思想基础上的，其根本要求是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基本内容包括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除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普及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等。

4. 三种“新文化”的区别与联系

判断革命的性质是根据革命的任务而不是革命的动力。旧民主主义新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共性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都是为中国民主革命提供文化支持的，在性质上属于民主主义文化。两者的区别在于指导思想的不同，旧民主主义文化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指导，属于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说它是“新文化”，主要相对于中国当时顽强存在的封建旧文化而言）；新民主主义新文化中居于指导思想地位的是共产主义思想，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4-705页。

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9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社会主义新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共性在于两者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范畴。但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尽管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并且毫无疑问应该大力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因为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就不能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也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领域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文化所要求的一般地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文化，而是反帝反封建文化；整个文化的服务对象也不是“清一色”的无产阶级，而是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文化的内容不只是无产阶级文化，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思想文化。一言以蔽之，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处于指导思想地位的共产主义思想与反帝反封建具体内容的新民主主义双重性质。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区别在于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态度：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承认资本主义文化的作用并且要求利用资本主义文化的，而社会主义文化则要与资本主义文化进行“彻底地决裂”——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由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必须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同作为整个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①。

二、新文化的制度设计和实践走向

政治经济存在决定文化存在。有什么性质性质的经济与政治，就有什么性质性质的文化。新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决定了新中国的文化。

1. 新中国新文化的根据——处于过渡状态的新民主主义新政治和新经济

中共在延安时期就确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认为，由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所深刻决定，在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需要经过一个社会主义因素主导的，既非完全的资本主义又非完全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利用这个“不可移易”的时期，发展社会生产力，等到建立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业基础”后，再“瓜熟蒂落”地采取实际的社会主义步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状态”的基本内容是：其一，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上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在政治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但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视为“人民”范畴的基本组成部分。其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核心是共产党领导、国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等社会主义因素，发展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体系和范畴。其三，经过大约15年左右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物质基础，之后再采取“实际的社会主义步骤”，向社会主义过渡。1949年9月，中共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②，并且以此为根本原则，通过了《共同纲领》这部“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③。

新民主主义理论所强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策方针，丝毫不意味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淡化“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④这个根本信念。新民主主义就其实质来讲，都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恰恰是为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而不得不进行的“迂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5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3页。

回”——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基本的物质基础、政治力量和思想条件，以及为了应对敌强我弱的困难局面和减少打击面以消灭主要敌人的策略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形势不断变化，以及“敌、友、我”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共在实践过程中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看成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即新民主主义社会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①，是一个社会主义因素不断生成、资本主义因素不断被消除的，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变化的过程。这种背景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实践，根本特点在于“立”而“不确”：此时是建设新民主主义，要进行长期准备之后再采取实际的社会主义步骤，将这一原则明确写入《共同纲领》，是谓“立”；但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内容及其实际内涵的认识是变动的，是谓“不确”。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实践，实质在于不断强化社会主义因素的领导地位和决定作用，基本趋势是一个社会主义要素的比重不断壮大、非社会主义要素被利用、引导、限制和改造的动态不断地削弱的发展过程。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可能困惑于最初的设计和实际的变化，其实毛泽东在1953年就已经把这个历史实际归纳得很清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②——从1949年建立新中国后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

2. 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文化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体设计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与这种经济与文化相适应，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化设计认为，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也要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阶段，新民主主义文化同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是一致的，并强调这一文化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方法，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但这种文化并不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因为当时在政治上经济上尚且有资本主义成分，而且这一成分的存在是“合理的”和“有益的”，所以，允许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地奴化思想以外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合法存在，同时，也要看到其“有好的一面”，譬如“他们还是爱国的”，在反帝反封建方面“也有它好的一面”^③。

然而，如前文所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积极变化，中共领导人逐渐倾向于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作为由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文化，自然也有这个实践的要求。纵观1949年到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实践，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发展线索：新中国成立后，以《共同纲领》为指导，中共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但随后不久，又开始了向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转变。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对待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这一问题认识的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文化过渡的状况，因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区别关键在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态度上，一旦开始肃清“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化过渡的开始。这种认识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④。

第一阶段：允许资产阶级思想一定范围内合法存在的同时，强调其“思想体系是不正确的”。

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也存在一个不能“四面出击”的问题。同时，中共认识到，对待观念形态的转变问题应该谨慎，必须反对“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因此，对待思想改造，都是以接受《共同纲领》为界，“而不宜过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85页。

②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93页。

④ 当然划分这种“阶段”是为了研究问题的需要，并不是说每个阶段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

此限度”。与此同时，逐渐强调要注意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本身与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是有原则区别的，“共产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意识是最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是最正确的。这个当然要讲”^①。

第二阶段：“虽然现在不能宣布它非法，但是我们一定要批驳它”^②。

随着实践的发展，大约从1951年5月批判电影《武训传》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开始，新闻宣传就开始强调：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工人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还有一个谁战胜谁的斗争问题，确立无产阶级思想的一元化领导地位也必须消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对于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肃清，也肃不清”，但是，“要批评”，“不驳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谁胜谁负的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战胜呢？还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战胜呢？如果我们让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人民中间占了上风，接着资产阶级就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占上风，那么，中国革命就要失败”^③。与此同时，更不能允许资产阶级思想侵入共产党内^④。

第三阶段：明确点明“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能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

大致到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中共领导人开始强调要批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以确立马列主义——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而这种马列主义即工人阶级思想领导的确立，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这里面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内容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其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而资产阶级思想却不能不受到批判和改造。”^⑤ 1951年9月到1952年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1951年12月到1952年10月的“三反”“五反”运动，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发展成为改造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确立新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社会指导地位的政治运动。运动中要求知识分子批判和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反”“五反”运动不仅是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同时也是思想斗争。这次运动明确要求把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本质揭露出来，进行斗争，“斗争就是改造”^⑥。“三反”“五反”运动，在“思想方面的收获主要是划清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界限……资产阶级思想受到了系统的同时是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罪恶是暴露无遗了，在群众中已经失掉了威信，它已很困难再蒙蔽广大群众，引诱广大群众走上错误的道路上去”^⑦。

正是通过针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不断升级的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中共将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方针贯彻到整个国民文化教育之中，迅速走向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的转变。

三、确立新文化的具体实践和鲜明特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新中国要有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以新文化来促进和巩固新经济和新政治的确立。“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不但是振奋社会人心的口号，也是新政权付诸文化改造实践的政策导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改造，就

① 《周恩来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2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93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93页。

④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7页。

⑤ 周恩来：《“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1952年1月5日），《人民日报》1952年1月8日。

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35—236页。

⑦ 薄一波：《为巩固“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胜利而斗争》，《人民日报》1952年7月1日。

基本内容而言，“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无产阶级思想清除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思想，同时批判资产阶级思想”^①。

1. 与文化领域相关的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破”和“立”

这里的“破”是指破除支撑旧文化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清除和改造旧政府和文化方面的国家机器、规章和准则。主要包括肃清旧的新闻、出版、宣传、报刊、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管理机构与规章制度，处理受西方影响的宗教、文化、教育和救济机构，荡涤封建势力和封建羁绊等活动。这里所说的“立”是指确立和巩固新文化“物质的附属物”和制度规范等，为把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灌输与传播而建立机构和“建章立制”。这主要涉及新闻传媒、宣传系统、文化教育、出版系统、思想政治、执政党的政治教育部门等文化领域的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的形成、调整和巩固。通过这些工作，为我们党领导建设新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支撑。

2. 思想上层建筑的“破”和“立”

这里的“破”是破除和清理旧的观念上层建筑，即在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中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以及改造旧思想意识、旧习惯和小生产者心理等。它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学习活动”“批判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等形式完成的。通过批判帝国主义侵华的本质和恶劣行径，批判旧中国政府的反动、封建、专制和卖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腐朽性，以及揭露所有这一切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与严重危害，构建起旧社会旧政权的“负面性”，激起广大民众对它们的憎恨和厌恶。“立”是指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贯彻、宣传和普及等群众性实践。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以及向全体社会成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论证与说明中共建立新社会的人民性质和美好前途，为社会各方提供一个充满美好期待的“新社会”共识，从而赢得社会公众对中共领导的新生人民政权的普遍认同，构建起社会价值体系和共同的政治信仰，为建设中共领导的新政治新经济提供文化支撑。

3. 寓文化改造于政治运动中，以政治运动支撑文化改造

中共自成立伊始，就以政治动员作为凝聚资源和力量的主要方式，在教育和发动广大民众接受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争取人民群众支持等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是与旧社会“彻底决裂”、建立一个“新世界”这样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不经过充分的社会动员是难以完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几年的历史，就是由一个接一个的党领导发动的“大张旗鼓”的群众运动合成的：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亿万人民在全社会深入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婚姻制度改革和移风易俗、文艺界整风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等。这些政治运动，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深刻社会变革，这些运动的本身就带有消灭旧文化、确立新文化的目的。实践也证明，这些政治运动对新文化的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譬如“土地改革运动”的文化意蕴就是反对封建文化；抗美援朝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和盲目崇拜西方的民族自卑心理；“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清理”“内层”“中层”和“外层”，为新文化建设提供了组织保证；“文艺界整风”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三反”“五反”运动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影响”……经过这些运动，广大群众从身份解放到政治经济权利意识都得到了空前提高，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对新社会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

4. 新文化的相对独立性

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文化对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不是消极的、简单的反映，而是一个能动的、

^①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06页。

复杂的过程，并且这种反映还遵循着它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如果说1949年到1952年的中共内部对于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何时向社会主义过渡尚且存在一定的争论、疑虑的话，这个阶段向社会主义文化形态转变的态度，则是比较一致和坚决的。值得注意的是，正式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因而意味着正式开始了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过渡（大致在1952年下半年开始），发生在正式提出开始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和社会主义政治过渡之前，即发生在1953年开始的“三大改造”之前，也发生在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和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不仅如此，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形成。

四、经验和启示

任何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并且这些都是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实践，是一个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并且向着社会主义方向过渡的时期。由此，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向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转变是历史的必然，从当时中国的历史发展态势而言，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这一文化转变的历史趋势。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文化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由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向全社会普及，逐渐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信仰和指导思想，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鼓舞了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新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基本经验

(1) 社会实践是新文化建设源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如果不承认毛主席把农民从文盲、疾病、营养不良以及散漫不团结之类缺陷中解放出来的决心，那是很不公正的”^①。社会实践是新文化的源泉。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使得广大群众从身份解放到政治经济权利意识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中国成万万的人民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在阶级斗争中，受到马列主义的教育，他们的阶级觉悟空前地提高。过去束缚他们的思想锁链已经被粉碎或者正在被粉碎。他们中有些人是通过自己受压迫的经历，一算帐，一搞阶级教育，提高了觉悟，接受了马列主义；有些人自己没有受过压迫，可是，听人家一诉苦，也有了觉悟，相信了马列主义。”^② 这一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实践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广泛的、有力的和不可抗拒的。

(2) 社会变迁对人们的思想变迁具有根本的塑造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③ 新中国的经济、政治与阶级关系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是新中国文化和社会心理变迁的根本动因。新的信仰和自我认同，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作为实践条件。在深刻的社会变革推动下，各种新的社会现象、新的思想理论、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行为方式，迫使社会各阶层去思考、比较、选择、学习和适应。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及其制度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新社会所要求的各种规矩、规范加以内化，以适应新社会规定的社会角色。这一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改造和建设要坚持说服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① [美]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59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2页。

(3) 把广大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广泛参与文化改造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文化领域工作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被广大人民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任务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是不可能完成的。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新文化与以往旧文化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的人民性,即新中国文化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要在较短的时间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不借助于大规模宣传、教育、普及的群众性运动的形式,把广大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广泛参与文化改造运动。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文化建设,中共以政治动员作为凝聚资源和力量的主要方式,诸如大规模的学习活动和批判活动;有组织的演讲、座谈;整风学习,思想改造运动;广泛地结合个人思想实际的自我批评等,取得了重要成就。这一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改造和建设必须走群众路线,广泛发动群众参加,争取人民群众支持,通过教育广大民众,使其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大众化。

2. 历史启示

就文化本身来说,存在统治阶级的思想即思想上层建筑与非统治阶级思想(民间普遍意识形态)之分。一般而言,文化都是处于指导地位的统治阶级思想与多元的民间普遍意识形态并存的。也就是说,文化固然是以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和灵魂,但新文化并不完全等同于主流意识形态,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多样化的民间普遍意识形态的合法存在和良性发展。中共最初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共同纲领》确定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是一元主导和多元并存的局面,既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和发展方向,又承认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地奴化思想以外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存在的客观性,并且明确提出反对宣传那些“不合乎于实际”和“不准备变为实际的东西”^①。

然而,我们看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实践,存在着三种“急于求成”的倾向:一是同经济改造中过于追求“公”和“纯”相似,在文化改造中也有一个认识误区,即急于要求批判和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②。新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不待言,但要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出发试图以之取代一切就失之偏颇了。作为文化服务对象的人民群众,包括各个阶级和阶层,其文化需求是不同的。即便是同一个阶级或者同一个阶层,他们的文化需求也是千差万别的。如果忽视文化需求多样性的客观事实,急于用新主流意识形态去取代“整个国民文化”,其结果势必会丢失许多必要的文化资源,最终影响到新文化的发展和影响的程度。二是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公式化、单一化的倾向。应该说,当时那种“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理的拥有者;反动阶级因其利益目标逆历史的潮流而动,他们总是歪曲地反映现实”^③的认识。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如果把这个观点作为公式套用,去评判思想观点的正确与否,就脱离实际了,因为具体情况很复杂,姑且不论每个个体也有产生错误认识的可能,即便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是教条,而是方法,而且需要具体化和与时俱进。至于某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简单地视为应该批判和肃清的伪科学甚至反动文化,是“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花朵”的观点,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三是存在着违背思想改造内在规律的急躁情绪。历史的创造从来就是在既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本身就是先前历史创造出来的,在他们身上不可能不“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④。因此,思想改造只能运用熏陶、教化、感化的方式,通过社会实践帮助人们逐渐抛弃旧思想、确立新思想。但是,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16页。

② 陈晋:《毛泽东与先进文化论纲》,《党的文献》2002年第2期。

③ 参见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页。

在“求效过急”的背景下，思想改造越来越趋向于“用政治批判取代学术批评”，“上纲上线到惊人的程度”，其结果就是“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①。

应该看到，新文化建设中这些急于求成的思想和政策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讲也是难以避免的，实践的结果并不能完全达到制定政策的初衷，形式上好像肃清了，而实质上仍然存在。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②，这势必为下一步的文化批判埋下了伏笔。这一切都为后人留下了深厚的历史教益。

参考文献：

- [1] 陈晋：《毛泽东与文化的社会主义转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 [2] 刘国新：《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0期。
- [3] 杨凤城：《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
- [4] 沙健孙：《毛泽东思想通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 [5] 郑师渠主编：《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
- [6]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

（编辑：张 桥）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选题导引

为使广大学者了解本刊关注的研究方向，现将2019年的部分选题发布如下，供大家参考，并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哲学：1. 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在当代的价值研究；2. 驳卡尔·波普尔的“反本质主义”；3. 驳哈耶克的“历史自发论”；4. 论唯物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而不是个人主义；5. 异化史观与唯物史观的比较研究；6. 实践本体论批判。

经济学：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论研究；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研究；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研究；4. 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5. 新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研究；6. 人工智能与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7. 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 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3.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100年；4. 五四运动百年来的中国社会革命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1.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2. 新帝国主义研究；3.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总体态势研究。

感谢大家2018年对本刊的关注和支持！希望2019年我们共同努力，刊发出更多优秀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

2018年12月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3页。